



第十五辑

惠城文史資料



惠州市惠城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惠城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惠州市惠城区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一月

# 惠城文史资料

## 第 15 辑

主 编：邹永祥

副 主 编：黄玉昆 黄秀清

编 辑：欧阳锋 张国明

封面题字：祝国沛

封面设计：胡振杰

字 数：17 万

印 数：1000 册

地 址：广东省惠州市中山北路 65 号

邮政编码：516013

电 话：2231325 2224554

印 刷：惠东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9 年 1 月

准 印 证：98 粤印准字第 1435 号

工 本 费：12 元

# 目 录

发生在惠州市三中的惠州首宗武斗	丘其文	(1)
彭巨光之死——“文革”回忆（一）	黄德芬	(11)
惠城土地改革简述	罗锡俭	(19)
回忆惠州民进的创建初期	梁大和	(22)
解放前惠州工商业的经营之道	廖伯腾 张焕棠	(34)
成立 35 周年的惠州市橡胶制品厂	林 宽	(39)
惠州市机床附件厂	丘其文	(46)
惠州服装业今昔	林 宽	(52)
解放前后的惠州食品业	廖伯腾 张焕棠	(59)
食嘴头	叶伟强	(63)
惠城草地的变迁	罗锡俭	(66)
解放前惠州街坊办的几项公益事业	梁自力	(72)
东新桥桥务委员会	梁自力	(77)
昔日的惠州商业步行街	廖伯腾 张焕棠	(79)
怀念编史挚友彭炳清	刘 型	(83)
我的父亲和叔父	邹佩麟	(88)
两航起义与廖仲爽先生	郑定原	(96)
教育战线上的名将——黄焕秋老校长纪略	白 尚	(104)
梁鼎芬与惠州	廖辅叔	(108)
忆父亲陈文光	陈 荣	(113)
老八路李冬青	叶伟强	(117)
陪同名人参观纪实（二）	吴定贤	(124)

关于“函是”	陈甫	(129)
潜珍书屋联话	吴仕端	(131)
望野亭畔观文物	吴定贤	(140)
关于大型组画《烈火红心》的创作及其他	张国明	(145)
漫谈惠州的祭灶	吴仕端	(147)
惠州方言的助词	刘若云	(150)
漫话惠州方言（续四）	吴定球	(162)
民国时期的惠州童子军	叶伟强	(173)
小学生活追忆——忆母校八保小学	蓝天照	(177)
惠城区业余体校	林红心	(183)
玛丽医院与白云医院	管丽芳	(191)
惠州中国象棋活动点滴	林宽	(198)
惠城区丝虫病的防治	傅子宏	(202)
读作编：真实是文史资料的生命	赖兆周	(205)
惠城之最：气候之最	赖兆周	(144)
岁月留痕（老照片 5 帧）	103、封二、封三	
文史动态 6 则	(10、58、71、116、130、139)	
新志掠影	(95、112、123)	
史林折枝	(33、45、149、161、182)	
勘误	(206)	

# 发生在惠州市三中的 惠州首宗武斗

丘其文

惠州市第三中学（原华侨中学，今又恢复原名）本是一间师生很团结的学校，“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社会上“两派”势力参与和挑动下，1967年8月，学生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武斗。这是“文革”期间惠州地区发生的第一场武斗，不久之后竟发展成为全市性的“两派”武斗。回顾此事，虽已过去30多年，但人们仍记忆犹新。

市三中创建于1957年，前身是市华侨中学。该校在建校以后的近10年时间，校风校貌，教学秩序，教学质量，都公认是很好的。特别是在勤工俭学和改善教学环境方面，更有突出的成绩。例如师生一起坚持多年，从离校100多米的西枝江边取土担泥，将校门前面水深1米多的水塘填成一个约60米×60米的操场，受到当时教育部门和广大学生家长的普遍赞扬。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之后，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在上面批判所谓“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批判所谓“彭、罗、陆、杨”的一系列错误路线方针的影响下，上挂下联学校本身，先后在校内进行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师道尊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些批判斗争过程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和伤害。特别是那些责任心强，有教学水平和平时管教较严的教师，有的

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有的被列为“师道尊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被作为“牛鬼蛇神”进行挂牌轮番批判斗争。实践证明，这些所谓批判斗争，完全颠倒了正确与错误，混淆了是与非的界线，不仅严重的打击和挫伤了教职工的自尊心和责任感，而且也人为地制造了师生之间的矛盾和学生之间的不和。例如，一部分学生要斗批的这位老师，另一部分学生则要保这位老师。这种人为制造的矛盾和分歧，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为相互敌视和对立。

8月，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传入惠州。由于它对青少年学生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的挑唆下，原有的团结友爱和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受到了一股以出身划分什么“红五类”和“黑七类”的黑浪冲击，严重地制造了学生内部的分裂。某些出身工农兵的学生以“自来红”标榜自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那些出身比较复杂的学生，则背上了无形的思想包袱，产生悲观消极情绪。

9月，新学期开始，新招初一级3个班，原有的初三级4个班按上级通知留校闹“革命”（毕业不离校），包括原有初二级2个班和初一级3个班，合计12个班600多学生。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学校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至当年底有大小红卫兵组织20多个。这些红卫兵组织人数多的100多人，少的仅有几个人。这时，学校已无法正常上课，进入全面“停课闹革命”；很多学生组织集体走出学校，到省内外进行“大串连”活动。留校的学生则天天向校总务高友亮要纸笔墨等文具，写大字报大标语指名道姓的揭露这个批判那个，高喊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那种狂热程度简直无法理解，像是着了魔一样。

1967年初，广州“东进”串连队来惠串连之后，有些红卫兵组织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口号，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打、砸、抢、抄活动。2月20日，惠阳高级中学红旗派“风

“雷激”兵团，强行抢市一中东风派“东江纵队”兵团设在中山西路口的广播站，此举成为我市“文革”期间打砸抢的典型先例，起到了极坏的影响。

3月之后，三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合并成几个组织，原则上归属两大派，即“红鹰兵团”为主的东风派和以“挺进战斗队”为主的红旗派。此外，也有两派都不参加的“自由派”和“逍遥派”。“东风”和“红旗”两大派，在各种场合都利用大字报和大辩论，极力宣扬本派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革命造反派；都高喊要坚决打倒所谓的“刘、邓、陶”！都声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对对方组织则采取一概否定和敌视态度。红旗派组织成员谩骂东风派为“老保”、“铁杆保皇派”，东风派组织的学生则诬蔑红旗派为“牛鬼蛇神组织”，“牛鬼蛇神造反”。两派学生组织形成誓不两立态势，结怨越来越深。

当时，市三中有一部扩音机（带喇叭）和一个大鼓，是两派学生都想得到的东西。而这两件东西均掌握在东风派学生组织手中，东风派学生组织利用自己掌管的扩音机天天宣传本派观点。学校的那个大鼓当时在惠州是很有名的，鼓声响亮无比，每逢学校擂鼓时，全市都能听见。东风派学生常以擂鼓为号通知本派同学回校活动；在同红旗派辩论时也常常以擂鼓为本派助威。当时由于市三中红旗派是少数派，在本校无法与东风派相抗衡，为求得外来力量的支持，逐渐向相距约200多米的红旗派学生占多数的市二中靠拢。同样，市二中的东风派学生属少数派，很自然的也向东风派占多数的市三中靠拢。这一形势的发展，促使两间相距不够300米的兄弟学校，逐渐形成两派进行对立活动的基地。

1967年5月，市三中红旗派同学向掌管大鼓的东风派组织提出“借用”大鼓要求。东风派的学生认为大鼓是市三中学校的公物，不同意红旗派学生借出学校拿到市二中去使用。

三中红旗派不服，准备强行抢夺。6月30日晚约8时，东风

派学生回家吃晚饭还未返校时，数名三中红旗派学生乘夜色掩护潜回学校，登上存放大鼓的三楼学生宿舍，把大鼓抬到地下，快步抬出校门，向着市二中方向走去。事有凑巧，恰好被东风派返校的学生看到，即时大声呼喊：“有人偷鼓呀！”这一突然的喊声，吓得红旗派学生加快了步伐，抬着大鼓拼命往市二中方向奔跑。抬着东西跑毕竟是跑不过单人跑的，跑至距离市二中不到100米的原广汕公路，即被截住，双方当即对抢，数双大手同时抓住大鼓的边缘又推又拉，谁也不愿松手，从公路上抢到路北面的牛皮路塘的中间。由于天黑，双方的人看不清大鼓的究竟，只顾拼命的争夺。此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大鼓烂了啦！”刹时像是发出停战令一样，双方即时松手，停止抢夺。在看到大鼓确是被划破一个大口之后，10多人即泄了气，个个像落汤鸡，从头到脚满身泥水，无精打采地陆续爬上公路相互责备对方。红旗派的学生先退进市二中。东风派的学生因对大鼓有感情，看到大鼓被划破，有的学生忍不住伤心的哭了，有的则不甘心就此丢下它，重又跳进塘里，把已划破的大鼓仔细用水洗干净，拉上陆地，抬回学校。这次事件，双方只是抢鼓，没有动手打人。尽管如此，在抢鼓过程中，仍有多人被塘中的玻璃杂物划伤手脚。

抢鼓之后，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展开了追究破鼓责任的骂战。此后，市三中的红旗派学生不再回市三中活动，全部撤到市二中。市三中东风派学生利用本派掌管的广播高音喇叭对着市二中方向，不断揭露批判所谓的“抢鼓阴谋”和“破鼓罪行”。市二中的高音喇叭也对着市三中方向不断反击，展开了新一轮的唇枪舌战。这些骂战的不断升级，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7月后，由于受到全国各地出现的武斗形势的影响，惠州的武斗气氛一天天趋向紧张，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市三中当时是东风派在桥东片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据点。可是，它又是处于红旗派占统治势力范围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它形成两派必然进行争夺的焦点。

就市三中本身而言，谁也没有力量阻止这种形势的恶性发展。驻校军训团（解放军）只有3个人，左右为难，无能为力；学校党组织早已瘫痪，学校领导受冲击后“靠边站”，说话没人听；学校教职工即使各有不同观点，在行动上普遍保持中立，既不回校也不公开参加派别活动。在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理化科组长陈培灼老师，为避免教学实验用的剧毒化学品被用于武斗，在8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带了一把铁铲回到学校，开锁打开实验室的铁门，把存放在容器里的氰化钾约1000克，硫酸400克，盐酸400克，硝酸400克，连带容器全部装进一个木箱，端出学校，在学校右侧道路旁的垃圾堆挖了一个深坑，把全部容器倒进坑里打烂盖土埋掉。校总务高友亮老师则怕厨具被用于武斗，回校把劈柴用的斧头，切菜用的菜刀等利器全部用麻袋装好，拿出学校，藏到一个偏僻的安全地方。

8月10日前后，以市二中为据点的红旗派多次派人传话，勒令东风派“红鹰兵团”撤出市三中，一次次均遭到坚决拒绝。后又改口要借用扩音机和高音喇叭。当时，东风派“红鹰兵团”等骨干成员分析：“很可能像抢大鼓一样，前来抢夺扩音机”。据此，他们加强了值班防备。

8月12日下午的1时多，市三中东风派学生接得知情人转来的通知：“他们（指二中为主的红旗派）会前去抢扩音机，还说要借用学校……”。

市三中是一间井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物，里面四周有约2米宽的走廊连通，课堂、办公室、实验室所有门均是向内开，中间有100多平方米四方形的天井空地。西面加建了一层学生宿舍（即三层）。学校正门向西，东面伙房有一较小的后便门，只要前后两门紧闭，外人无法进入校内。因为东风派学生早有思想准备，对抢扩音机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他们分头组织防御：在学校大门顶上的平台放上4个百斤重的大石墩，大门除上栓外加用两张乒乓球桌顶住，伙房后便门上锁后再用散乱桌凳顶实。约在下午

3时，以市二中为主力的红旗派学生数十人，在原市三中的红旗派学生引领下，来到市三中南面的空地上，在距离学校10多米处停下分两边散开，大声叫喊：“老保，把扩音机和喇叭交出来！”又有的人叫喊：“铁杆保皇派，从市三中滚出去！”……不知连续叫喊了多少声，在校内面的东风派学生根本不予理睬。在校外面的红旗派学生看到学校前后门紧闭，喊话又无人答理，有些沉不住气了，在一些人鼓动下，有的人开始向三中门窗投掷石块。校内东风派学生听到一阵阵砖石投掷门窗玻璃碎裂发出的响声，气得火冒三丈，紧急动员全面应战，除留部分人员（女生多）在地下看护前后门和准备砖石块外，大部分人员撤上二三楼，从课室和宿舍的窗户里向着校外面的红旗派学生大骂：“牛鬼蛇神想造反呀！”“牛鬼蛇神妄想翻天呀！……”随着阵阵的骂声，从各个窗户里向红旗派的学生投掷石块砖块瓦片进行反击。另一部分学生则在东面二楼课室和西面三楼宿舍，用书桌重叠升至瓦面，各用板凳将瓦面撞开一个大洞，把数张书桌搬上瓦面堆叠成防石块的“碉堡”，在瓦面上居高临下向散布在学校周围的红旗派学生，投掷石头砖块瓦片。在学校里面，凡可被打碎用作武器的东西，包括地板砖、彩瓷砖，统统不能幸免，当作武器使用。顷刻间，学校内外双方的喊叫声、对骂声，砖石块的撞击声，玻璃碎裂声，震耳欲聋。近距离相互投掷的石头砖块瓦片，上下左右满天乱飞。此时此刻，学校周围恰似杀气腾腾的战场！这时，红旗派的学生有部分也登上了学校东南面家属宿舍的瓦面，当时在瓦面上走动的有一个学生险些跌落地下。军训团的解放军同志得知，数人赶来劝阻，冒着被砖石块打伤的危险，站在两派对峙相隔中间，手举毛主席语录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喊破喉咙也不起作用，根本没有人听。双方照样相互投掷，相持了约半个多小时。市塑料厂东风派职工20多人赶来学校北面的路边，准备组织力量帮助解围。此时，红旗派学生眼看无法取胜，主动将队伍撤回市二中。这场武斗，随即停止。原来在远处围观的人群，这时

拥向市三中观看究竟。

笔者作为三中校长，“文革”开始以来，两派虽在表面上怕被称为“保皇派”，都争着批斗我，但在私下里都在做我的工作，以争取我的支持。那天听说学校武斗，我曾急着想赶回学校做些力所能及的劝阻工作。走出家门不远，邻居李师傅得知我想去学校，极力劝阻我说：“平时两派都说你是什么后台，现在学校已发生武斗，你不怕抓后台抓黑手吗？”这句实在话使我猛醒过来，不敢再向前多走一步，当即退回自己在水东东的住家，走上家中天面小平台上观看情况。不久，听到武斗结束的消息，我即时赶回学校。走到校门口时，看到东风派的林同学躺在担架床里，受伤的右前额流血不止。他看到我走近时先开口：“丘校长……”一句话未说完，泪水随即流了出来。当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内心极其沉重地劝慰他说：“不要怕，到医院会很快治好的……”不敢再多说什么。当即数位同学抬着他送往医院救治。红旗派学生也有轻伤。因为东风派的学生仍在学校里面，为了避免嫌疑，惹出是非，我不敢进入学校，在学校的四周粗略看看之后，非常难过地返回了自己的家。

当天晚上，“红鹰兵团”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回到学校。约 11 时，知情人转来紧急通知：“红旗派有人策划对三中全面停水断电，准备用 10 多张棉被和两桶汽油进行火攻”。“红鹰兵团”领导成员接此情报后，认为情况危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对同学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决定当晚撤出学校。经过一番紧张准备之后，于深夜 1 时多，男女同学 40 多人集队高举兵团旗帜，打着锣鼓（已划破的），在市塑料厂和桥东部分东风派的职工伴随下，一路高唱歌曲，经水东街过东新桥，中山东，中山西路，撤到平湖门百货大楼三楼为新的活动据点。从此，两派基本上以东新桥为界对峙：桥东片基本属红旗派为主的地盘，桥西片则属东风派为主的地盘。双方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面“武卫”的阶段。

8月13日上午，市区气氛迅速趋向紧张，各粮站出现大量居

民排队抢购粮食的“人龙”。

在得知东风派学生撤出学校之后，我于 13 日上午回到学校。军训团的黄华靖指导员在学校，我们两人一起从地下到楼上全面观看了这间曾经历武斗的学校状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楼下楼上 12 间课室，还有办公室、实验室、储藏室、伙房、宿舍等建筑物的门窗玻璃几乎全被打烂，遍地是横七竖八的破凳烂桌和打碎的地板砖、彩瓷砖。二楼的实验室铁门敞开着，里面空空，楼板铺设的高级彩瓷砖全被挖空。二楼东面的课室瓦面开了一个通天的大洞，踏着叠起的书桌可以上到瓦面，瓦面上用数张书桌堆成一个“碉堡”；西面三楼瓦面上也有一个同样的“碉堡”；瓦面上撒满碎石砖块瓦片，呈现出累累伤痕。看到学校上下内外破烂到这个样子，内心极其沉重难过！两人不断发出叹息声，都在发问：“为什么会这样？”走到正门上面，看到数个上百斤的大石墩仍在平台上，又感到庆幸地说：“如果对方从正面进攻大门的话，这几个大石墩砸下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返回地下，这时才发现，学校上课用的挂钟和电铃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乘乱打劫的人偷走了。

东风派“红鹰兵团”在学校时，两派双方不惜武斗都要争夺这间学校。但在该兵团于 12 日晚撤出学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两派的学生都不涉足这间学校。教职员自“停课闹革命”之后，谁也不想回学校，武斗之后更不愿回学校，免得自找麻烦。但是，我身为校长，虽然挨了不少学生批斗，组织上没有宣布撤我的职，我仍要履行我的职责，尽管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对学校的设施不能不管。从 8 月 13 日起，我天天一个人回到学校看守这间破烂不堪的空校。那时不少人同我开玩笑说：“你这个校长呀，现在变掌校了”。好在当时学校雇有一个看守学校鱼塘的临工陈佛带同我作伴。他懂得武艺，随身带着一支长棍，日夜巡视鱼塘。他看我一个人在学校，拍着胸脯向我表态说：“有我陈佛带在，你不用怕……”在那全市性武斗一触即发的非常时期，恐怖笼罩着每一个

人的精神世界。大家都心知：在那无政府主义极端猖獗，“公检法”不起作用的日子里，作为个人，谁能保得了谁呢？说句老实话：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学校都是在无限恐惧中度过的。每当想到昔日曾是书声琅琅热气腾腾的学校，此时此刻变得这样破败寂寥悲凉，就心痛难过！远处的高音喇叭常常打断我的思绪，不时传来两派之间的对骂声，间中也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绘声绘色的所谓“揭露”和“控诉”，述说的那些事例不知是真是假，听了无不使人心寒胆战！

8月20日前后，桥东水东街一带断断续续实行“戒严”，不定时的抓一些所谓“走资派”审问，随之而出现的各种吓人的谣传很多。此时，驻校解放军何伦信教导员和黄华靖指导员找我谈话：“丘校长，现在形势变化莫测，事态越来越严重，你在学校一个人，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劝你最好找个地方避一避。学校吗，我们会完全负责看好”。这件事因来得突然，我又缺乏思想准备，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身无分文，连手巾牙刷内衣裤都没带，怎么办？”他们听我说后，当即凑了10元钱30斤粮票交给我，催促我赶快走。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以惶惶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头戴一顶旧草帽，脚穿一双旧拖鞋，假装沿街看大字报，一步步向惠新西街走去。先到了我信得过的叶维新老师的家，准备暂躲些时间。叶老师看到我到了他家，更吓坏了！他说：“我家常有人来串门，对你更不安全！”我说：“我的安全就靠你了。”他急中生智，进房拿了一个印有“红旗”字样的红袖章，往左臂一戴，说声“走！”领着我向惠新中街方向走去。通过高级中学门前“岗哨”和惠新东“岗哨”的检查质问，他都巧妙地取得了信任放行，一直把我送到东平远离市区的第六生产队。他说：“可以自己走了……”从此，我逃出了当时笼罩着武斗恐怖气氛的惠州城。

不久，武斗结束，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1968年9月，这间曾遭遇过“武斗”劫难的惠州市第三中学，不幸又在“精兵简

政”口号下受到了极左风潮的冲击，建制被正式撤销，学校校舍及各种教学设施，原有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合并归为惠州市第二中学。

现在下角中路的第三中学，不是“文革”期间曾发生“武斗”的那间第三中学，而是后来新建并于1971年9月开始首次招生的市第三中学。

(作者单位：惠州市规划局)

·文史动态·

## 迎接远方亲人

1998年3月17日，泰国《星暹日报》发表徐志达的特写：《迎接远方亲人》，兹摘录如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间成立近八周年的泰国曼谷惠州会馆，也是泰京一个注册合法侨团。会馆副理事长兼财政钟燊培于1月12日上午在该会迎接来自中国广东省惠州市亲人惠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熊林祥先生，彼此交换了甚多宝贵意见。林祥君畅谈家乡近年各项建设在突飞猛进中，此次莅泰，乃是为了了解自大陆解放前后，乡亲离乡别井，在泰谋生情况，以作编辑惠州市志侨务章用。

众人皆知，惠州是东江侨乡之一。惠州人不仅移居海外较早，而且遍布世界各大洲四十几个国家或地区。广大海外华人，迫切希望祖国强大，国际地位提高，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正当利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1950年6月24日惠州镇又成立归国华侨联合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保护华侨权益的政策。广大惠州侨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共同建设惠州侨乡。林祥君这次访问会馆，深受热情接待。陪同者还有常务理事兼福利股长徐志达，交际陈日生，总干事林培仁等。（志人）

# 彭巨光之死

——“文革”回忆（一）

黄德芬

提起“文革”，我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彭巨光之死。尽管在“文革”中我本人也历尽劫难，但对自身的遭遇反而慢慢淡忘了。然而，彭巨光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及他自杀前前后后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永远也抹不去。

彭巨光是惠州一中的教导主任。我从1958年入校至他去世与他共事八年。“文革”初期他并不在学校，早抽去搞四清了。1966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踏进校门就被红卫兵勒令：“去看彭巨光的大字报，写检举揭发材料！”那时，我早在运动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被揪出为专政对象，除了晚间还被允许回到自己那6平方米的小房间过夜外，其余时间都在“革命群众”监管下度过。我心头一震：“哟，彭巨光也被揪回来了！”看大字报的标题：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彭巨光揪出来示众！我心中嘀咕：“又要揪当权派了。只是论学校的当权派，放着在校的几个校长为什么不揪，要去揪一个小小的教导主任呢？”再看大字报的内容，记得的有那么三条：一是说彭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彭本是贫下中农出身，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呢？原来他是靠宗族祠堂缴读大学的。宗族祠堂用祖上置下的田产供宗族子弟读书是解放前东江流域一带客家的风俗。解放后拥有田产的宗族祠堂被定为死地主，这样彭

巨光就被扣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哪管他是早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的共产党员。第二条揭发他某年开学时写了一副对联“学海无涯勤是岸，满园春色好读书”高高贴在校门口“鼓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走白专道路”。第三条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管卡学生、迫害工农兵子弟。这条最厉害，把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说成是修正主义条条框框，都推到他身上。列举的迫害工农兵子弟事例如×××受处分，×××留级等等，主要是部队子弟。当年一中部队子弟云集，惠阳驻军各级军官的子女一大批都在一中。其中一些学生（特别是高干子弟）在校骄横跋扈，无心向学，学校曾花大力气管教他们。“文革”一来，这些“自来红”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红卫兵，敢作敢为，冲杀在最前面。在前段运动中，我已吃尽了这班人的苦头。想到这点，我为彭巨光捏了把汗。那天早上从图书馆传来阵阵的口号声：“彭巨光必须老实交待！”“不许彭巨光狡辩！”……知道他已挨批斗了。

不几日，彭巨光也被送来我们的“牛鬼队”。那时一中先后被揪出的“牛鬼”已上 10 人，每天早上在大操场列队点名。那天眼看两名红卫兵押着彭巨光过来，心中说：“又多一个。”说来惭愧，我那时直是幸灾乐祸，“牛鬼蛇神”越多，我就越觉坦然，越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感。彭巨光却显得很倜促，他看着一个个他所熟悉的教师被剃了光头，挂了黑牌的怪样，惶惑、惊讶得张大了嘴。开始他认不出我，看了悬挂在我胸前验明正身的大大的黑牌，注视了好一刻，抬头看看我的头脸，又低头看看那块黑牌，目光上下来回扫了好几遍，那一副惊愕的神情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可不是，我也不知那时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了：被剃了光头，摘去了眼镜，穿一身自缝的黑色对襟衫……谁还能认得原长发披肩，架着眼镜，颇为斯文秀气的年轻女教师呢？他惊叫了一声：“黄德芬！？”声音从心里发出，很轻、很轻，但是我听到了。我迎视他那疑惑的目光，回应他的叫唤，轻轻地向他点点头。他那疑惑、惊讶的目光直盯着我，回应我的点头，他也点点头。随后又摇摇头，